

基礎上，如何將漫畫、雜誌從消費主義享樂轉向為國家戰爭服務的過程，甚至是重建其讀者群體、幫助讀者轉向戰爭狀態的過程。在此基礎上，作者試圖改變我們閱讀漫畫的方式，在材料語境中考察漫畫。

第三章以張光宇的《西遊漫記》展示出漫畫在國共內戰時期更深刻的變革。歷來對《西遊漫記》的解讀側重於張氏對國民黨政權腐敗專制的諷刺，近來的研究雖然注意到他在漫畫中使用的視覺元素與國民黨審核機制的互動，但作者從「圖像轉向」的角度出發，試圖超越諷刺，將該作視為戰前漫畫與雜誌在法租界庇護下蓬勃生長年代的緬懷。內戰時期的漫畫在多重因素影響下，生存空間不斷被擠壓，漫畫雜誌逐漸走向衰落卻並未消亡，而是朝向社會主義政權意識形態變革。

第四章以毛澤東時代延續時間最長、影響力最大，並且在國家資助下的《漫畫月刊》探討 1950 年代的漫畫。對這一時期漫畫的研究，多半離不開 Edward Hunter 極具意識形態色彩的「洗腦」論述。但作者堅持在圖像轉向的軌道上考察《漫畫月刊》作為出版物對舊時代漫畫雜誌遺產的繼承，以及被納入國家宣傳的過程。傳統上認為漫畫在反右鬥爭後走向衰落，但如果不把漫畫的定義局限於政治漫畫，事實上漫畫仍持續存在。直到 50 年代末，隨著大躍進和知識分子上山下鄉，漫畫才真正

喪失了與城市日常景觀和世界的敏感性，徹底屈服於國家宣傳。

最後，作者在結語中表達對漫畫的思考：一為解答該書為何使用“manhua”而非英文中常用的“cartoon”或“comic”，即「諷刺漫畫」或「連環畫」的含義，因為它們不僅限制了觀察視野，而且也不易保留詞語所蘊含的歷史；二為對其他漫畫形式與對本書研究範圍的重申；三則餘論 60 年代後的漫畫狀況。漫畫在文化大革命期間作為大眾傳媒而興盛（大字報），結束後則回到畫報雜誌的途徑。隨著 80 年代外來文化的傳入，以日本漫畫為代表的新型漫畫逐漸取代傳統漫畫。另一方面，獨立漫畫依舊存在，藉助網路反對商業化產品的無趣。

整體而言，全書展現出作者對漫畫的獨特觀察。但也如他在結語中所提到的，該書在材料方面仍有不足，只是將研究範圍限定於漫畫雜誌，而沒有涉及到諸如報紙、展覽、宣傳、塗鴉、海報、橫幅等等。另一方面，儘管作者嘗試脫離民族主義或意識形態來研究漫畫，但需要注意的是，民族主義和意識形態可能與現代性、城市經驗並不衝突。無論如何，本書對於漫畫的別樣理解，為往後的研究提供了另一種切入角度。（史隆，南開大學日本研究院碩士生）

鄉役と溺女： 近代中国鄉村管理史研究

山本英史

東京都：汲古書院，2021

524 頁，ISBN 978-476-2960-68-0

本書作者山本英史為慶應義塾大學榮休教授，素來注重對傳統中國的統治原則與實際運作之間關係



的探索。作者先前問世的兩部佳作《清代中國の地域支配》（東京：慶應義塾大學出版會，2007）、《赴任する知縣》（東京：研文出版，2015），分別探討清初統治的確立過程及州縣層面的實際運作情況，獲得學界的廣泛好評。本書為山本教授的第三本學術專著，其特點在於把焦點放到近代鄉村基層社會的分析上。

第一部「近代中國的鄉村管理與鄉役」由三章構成。第一章「蘇州的鄉村管理與鄉役」，根據三位故老的口述記錄來剖析地保和經造這一鄉役在清末民國時期的實際情況。此部分揭示出歷來被看作應予裁撤的諸類鄉村管理機構，直至南京國民政府時期仍然起著有效作用。第二章「從松江鄉役所見土地改革前史」，基於圖正等人的口述以揭示，鄉役不僅在土地改革前一定程度上起到維持秩序的角色，而且在土地改革的實施過程中，中共亦不得不徵求其合作這一新的事實。第三章「嘗試復原近代蘇州的鄉村社會管理」更進一步探討第一章所涉及的蘇州鄉役實際情況，在這個基礎上，與《中國農村慣行調查》等相關調研做比較，試圖從宏觀的角度把握二十世紀前半期中國的鄉役。

第二部「近代中國的溺女問題與其改革」亦由三章構成，在概觀明清至近現代溺女問題的基礎上，分析歷代政府及知識分子之應對。第四章「溺女問題及其源流」，基於溺女為何在清代尤其被視為一個突出問題這一問題意識，指出其主要原因為明代中期以降的奢侈化，及以中國東南部為中心進行的宗族組織再整合化所帶來的重男輕女觀念的強化。第五章「清朝溺女問題的應對」與江戶時期的日本進行了比較。作者指出，兩國雖然在溺嬰及其對策方面頗為相似，但是舉措更為徹底的日本與並不徹底的中國的區別在於，人口動向的差異以及基於國家制度差異所產生的不同層次的鄉村統治力度。第六章「近代中國的溺女問題改革」分析在清末以降直至現代溺女問題是如何被認識的，如何進行改革，作者的結論是直到1950年代中葉溺女問題才得以解決。

第三部「史料：基於詢問調查的口述記錄」收錄從

2006年8月到2015年12月期間，作者對七位故老進行實地採訪的口述記錄日文版。

本書的意義在於，從基層社會的層面闡明中國統治原則與現實的關係。在對中國的瞭解上，山本教授一向主張閱讀文本時，需要適當審視當局的原則和社會現實之間的相互關係這一視角。本書試圖揭示被偏見所遮蔽的基層社會現實，並成功地為今後研究提出有益的建議。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克服了史料的限制，引入一般居民的觀點。譬如，第一章考察在蘇州地區尤為發達的不在地主制之產物——租棧，在這裡擔任徵租任務的催甲與鄉役之關係，並指出「從中可知『地保』和『經造』並不一定是全面服從地主的，反而與他們保持一定距離，而在一些場合下甚至可能會站在作為地域住民的佃戶一邊的情形也是可以推測的」（頁28）。這一段是一個典型的例子。順帶一提，第三章分析《中國農村慣行調查》裡出現的鄉役形象，並指出對華北「地方」的負面評價是源於「參與村落管理的官員或縣政府職員的發言」（頁141）。這個觀點更讓人大開眼界。

筆者想商榷的是，如何看待最近中國有關國家制度與地方社會關係的區域史研究動態。在中國大陸，以華南為中心的區域史研究，試圖闡釋明清以來國家與社會關係的特性，自1980年代末至今已積聚諸多成果。其代表性學者之一劉志偉認為：「那些用文字寫下來的規定在整個明代社會運作過程中都是有意義的，但意義不在於這些條文是否被直接套用到現實中，而在於現實中一再從這些規定出發衍生出種種變通的做法，長久以來，成為了『制度』」（劉志偉、孫歌，《在歷史中尋找中國：關於區域史研究認識論的對話》〔上海：東方出版中心，2016〕，頁50）。這概括了「華南學派」的基本研究視角。筆者認為：這種研究潮流表明的是國家制度與社會現實之間的關係並不是零和關係，而是互補和互動的，這種平衡似乎到近代才被打破，矛盾愈來愈突出。很想請教作者對這種理解有什麼看法。（佐藤仁史，一橋大學大學院社會學研究科教授）